



## 经典作家之 蒋光慈

蒋光慈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白塔畈(过去属霍邱县),早在1921年春,他和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到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在十月革命的故乡,他一面汲取马列主义真理,一面进行文艺创作。

蒋光慈最早重视革命文学的理论建设,他是热心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之一。1924年8月1日,在《新青年》季刊第三期发表论文《无产阶级革命

## 《少年漂泊者》在中国文学和社会中的影响

□江 琼

革命作家蒋光慈是中国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也是最早被中国共产党秘密派往苏联“取经”的先行者之一。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应当是无产阶级一个重要的战斗武器,应当是“为光明而奋斗的鼓号”。因而在革命的队伍中蒋光慈拿起了文学的武器,利用文学作品倡导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任何价值判断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情境,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与革命的联姻是历史与现实情境的必然选择。蒋光慈的革命小说《少年漂泊者》对中国文学和中国革命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主要叙述16岁的皖西乡村少年汪中,父母被地主迫害死亡成了孤儿。在流浪生涯中,当过学徒、奴仆、乞丐、茶房、工人、囚徒等,最终选择加入黄埔军校,在革命的炮火中壮烈牺牲。作为蒋光慈的第一部小说作品,中国“革命小说”的发轫之作,《少年漂泊者》揭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册的新篇章。

首先,小说完成于1925年11月,及时而深刻地展现了从“五四”到“五卅”这一历史时期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现实斗争。自这篇小说始,中国文学出现了“革命”这一崭新的元素。蒋光慈曾提出:“谁个能够将现实社会的缺点、罪恶、黑暗……痛痛快快地写将来,谁个高喊着人们来向这缺点、罪恶、黑暗……奋斗,则他就是革命的文学家”。《少年漂泊者》则完满地体现了蒋光慈的这种认识。作者描写汪中由孤儿、奴仆、乞丐、工人、工会工作者以至最后成为一名革命战士的漂泊历程,涉及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多层次、多侧面地展示黑暗社会。同时还描写了“五四”运动、“二七”惨案和“五卅”运动等声势浩大的场面。汪中在攻打惠州城的时候,在枪林弹雨中毫无惧色,高喊着“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壮烈地牺牲,预示了中国人民所蕴藏着的伟大力量必将释放、爆发。因此,这一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开创性作品,被郭沫若誉为“革命文学的前茅”。

其次,作品采用“五四”时期不多见的书信体小说结构形式,以孤儿汪中致诗人维嘉的一封信,描写汪中近10年的漂泊历程和内心的不满与追求。《少年漂泊者》4万多字,由题诗、自序、十八节主体内容以及维嘉的附语四部分组成。小说开篇用《新梦》集中《怀拜伦》一诗作题诗,读者很快被一种高昂、奔放的情绪所感染。自序说明作者创作目的:对漂泊少年的悲惨命运,发出了愤怒不平的“粗暴的叫喊”;对那个吃人的黑暗社会,发出了深恶痛绝的“粗暴的叫喊”。故事情节的展开、环境心理的描绘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通过一封信即十八节主体内容形式来实现。在维嘉的附语中作者转换叙述者,叙述声音由写信人汪中转到收信人维嘉身上,维嘉对作品中书信的来龙去脉进行补叙,这样的叙事安排极大地加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和可信性,体现了作者在小说创作构思上的匠心独运,也使作品产生了独特的艺术效果。《少年漂泊者》与郭沫若的《落叶》、冰心的《遗书》、庐隐的《或人的悲哀》等共同对五四书信体小说的出现与发展做出较大贡献。

再次,人物形象鲜明。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汪中是众多受苦受难的农家孩子的典型。他在父母被地主残杀、迫害而死之后,被迫过上了漂泊的生活:他做过川馆先生的“随从”,受尽了狎戏与污辱;做过沿街乞讨的“乞儿”,受尽了饥饿和痛打;做过杂货店的“学徒”,受尽了资本家的

与文化》,以及后来写的《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等文中,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初步论述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和文学的阶级性诸理论问题。1928年后,蒋光慈结合当时革命文学问题的讨论,写了《现代文学与现代生活》《关于革命文学》《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等论文,连同他写的《太阳月刊》前言与编后记等,都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系统地、较为深刻地阐明了一系列文艺理论问题。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他已经看到,光暴露“黑暗”,挾制“罪恶”是不够的,还要“认识现代生活,而指示出一条改造社会的新路经”。蒋光慈阐发革命与文学的不可分割性,把摧毁旧世界与创造新生活作为文学的历史使命并提,无疑在当时起到了提高人民信心、鼓舞革命斗志的作用。他还号召作家深入生活,深入革命实际,“要求他们认识时代,了解时代的社会生活,要求他们与革命的实力接近”。他更希望作家坚定革命的立场和信仰。他认为,一个作家,如果“没有革命情绪的素养,没有对于革命的信心,没有对于革命之深切的同情……是写不出革命的文学作品的”。在《关于革命文学》一文中,蒋光慈提出了评判作家革命与否的标准:“倘若我们要断定某个作家及其作品是不是革命的,那我们首先就要问他站在什么地位上说话,为着谁个说话。这个作家是不是有反抗旧势力的精神?是不是以被压迫的群众作出出发点?是不是全心全意地渴望着劳动阶级的解放?……倘若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个作家就是革命的作家,他的作品就是革命的文学。如果说,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的见解与理论,在过去影响了无数作家走上为革命而写作的道路,那么对于今天革命观念有些减弱的文艺工作者,蒋光慈的话,仍会像洪钟大吕一样

剥削和摧残;做过洋货店的“小伙伴”,受尽了盘剥和屈辱;做过旅馆的“茶房”,受尽了辱骂和斥责……但是,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他曾到桃林投奔土匪,想杀富济贫,报仇雪恨;他支持学生运动,曾冒死为学生通风报信;他投入了“二七”大罢工,目睹了林祥谦烈士的英勇就义;他进入了黄埔军官学校,在东征攻打惠州时英勇牺牲。汪中这个“百折不挠的青年”形象,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极具时代色彩,他所走过的路,正是“五四”以后革命青年所走过的或者应该走的道路。因而,汪中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丰富多彩的典型形象。作者通过汪中的人物形象揭示了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人们要改变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只有革命这一条路可走。这对当时许多处于迷惘之中的青少年无疑是一个深刻的启示,因而出版后受到青少年读者的热烈欢迎。小说从1926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初版到1933年,先后印行15版,成为广大青年最喜欢的文学作品之一。另外,《少年漂泊者》是中国小说第一次正面描写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形象的作品。蒋光慈笔下的共产党员林祥谦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其形象之高大顶天立地,其事迹之感人鬼泣神惊,手持利刃的军阀在他面前显得何其穷凶极恶、渺小卑劣!小说人物形象刻画不仅鲜明,而且逼真。

最后,《少年漂泊者》具有自叙传色彩。在“五四”小说园地,郁达夫开拓出现代小说新的园地——浪漫抒情小说,增强了“五四”文学的多元色彩。郁达夫小说中的主人公多是夫子自道,他成为第一位把作家自我与小说主人公融为一体的文学大家。虽然《少年漂泊者》不属于浪漫抒情小说,但是它与浪漫抒情小说存在渊源关系。蒋光慈在创作《少年漂泊者》时不断回味自己的经历和无数生活场景,让这些经历和生活在作品中获得生机,带有明显的自传性。写信人汪中和收信人维嘉有作者本人的身影或精神气质,代表不同时期的作者。小说内容融进很多蒋光慈个人及其家族的历史,蒋光慈的自身感受显现其中。蒋光慈少时求学历程和汪中经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汪中是“安徽省T县P乡人”正是蒋光慈故乡安徽省霍邱县白塔畈乡的简写(白塔畈现在隶属于安徽省金寨县),汪中离开故乡到H城又经巢湖到W埠即是蒋光慈离开白塔畈到合肥又经巢湖到芜湖市立五中读书的经历,正是小说自我写实的特点,加上蒋光慈对浪漫主义的偏爱,使得《少年漂泊者》带有主观抒情的色彩。主人公汪中可以说是郁达夫小说中抒情主人公公形象,即“零余者”原型的时代变形,蒋光慈通过对汪中“漂泊之旅”的浪漫叙事,将“零余者”转变成了拜伦式的英雄。由此,《少年漂泊者》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朽之作之列。

二

鲁迅先生曾说过:“文艺是一种社会现象,是时代人生的记录”。从皖西乡村一隅走出的蒋光慈,深知百姓的苦难,《少年漂泊者》描尽现实社会的一切情形。如第二节开端一段描写:“在安徽省T县P乡有一乱坟山,山上坟墓累累……这座乱坟山倒是一块自由平等的国土,毫无阶级贵贱的痕迹。……或者这些坟墓中的野鬼,生前受尽残酷的蹂躏,不平等的待遇,尝足人世间的所有的苦痛;但是现在啊,他们是再平等自由没有的了。这里无豪贵的位置,豪贵的鬼魂绝对不到这里来,他们尽有自己的国土;这里的居邻尽是些同等的分

## 蒋光慈的文学贡献

□方 铭

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

蒋光慈不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而且是力行者。在文学创作上,蒋光慈的贡献是诗歌和小说。他说:“生值革命怒潮浩荡之时,一点心灵早燃烧着无涯际的红火。我愿勉力为东亚革命的歌者。”他先后呈献给读者《新梦》《哀中国》《战鼓集》和《乡情集》等几本诗集。

《新梦》是以讴歌社会主义给中国新诗坛带来耀眼光辉的。“贝加尔湖的清水/把我的心灵洗净了;/乌拉山的高峰,/把我的眼界放宽了;/莫斯科的旗帜,/把我的血液染红了!”诗人以清亮鲜活的嗓音高唱着热爱社会主义社会,追求真理的情怀;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伟大的列宁;同时怀念正处于黑暗深渊中的祖国和人民,并召唤祖国劳苦大众起来斗争,“高举鲜艳的红旗,努力向那社会革命走!”《哀中国》和《战鼓集》写于1924年至1926年,是在作者从苏联回国后,目击中国黑暗的现实发出的悲愤呼喊。激越的愤慨、庄严的召唤和深沉的悲叹交织在一起。而《乡情集》则是表达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人民转入新的革命历程后的思想和经历,是中国革命历程中的一个转折,也是蒋光慈文学创作的一个重大转折。

钱杏邨在1928年写的《蒋光慈与革命文学》一文中,曾说蒋的诗“简直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文学著作的开山祖”。在中国新诗史上,郭沫若以《女神》唱出了五四时代的最强音,而蒋光慈鲜明讴歌无产阶级革命的诗篇,为中国的政治抒情诗开辟了一大领域。

蒋光慈后期主要从事小说创作。中篇《少年漂泊者》和《鸭绿江上》等8部短篇小说,以揭露和批判旧社会的黑暗现实为主。《少年漂泊者》采用第一人称的书信体裁,较便于倾诉

短篇小说《都霞》是中国著名革命作家蒋光慈近90年前翻译的苏联短篇作品。这是蒋光慈翻译过的一篇重要作品,体现了他对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的感悟和审美情趣,也影响了他人本的创作。可是这篇作品自1929年3月在《新流月报》发表并收入蒋光慈著小说集《冬天的春笑》后,到现在各种蒋光慈文集和译著选本都没有选载。近乎是一篇佚文了。对于这篇作品在蒋光慈探索革命文学艺术性中的作用,研究的也不多。

蒋光慈在从事创作的同时,还进行翻译工作。蒋光慈还在莫斯科留学时就开始从俄文译介诗歌和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新文学进入20世纪30年代,翻译更是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以鲁迅、蒋光慈、夏衍、钱杏邨、叶以群为代表的“左联”成员,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倡导、译介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中坚力量。蒋光慈在1927年与瞿秋白(化名屈维它)共同写作了《俄罗斯文学》一书,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题为《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介绍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文学,下卷题为《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在作品翻译方面,蒋光慈选择的作家主要是富于革命色彩和阶级意识的作品。翻译了索波里《寨主》,爱莲堡《冬天的春笑》,谢芙林娜《信》,谢廖夫《都霞》,里别丁斯基《一周间》,曹斯前珂《最后的老爷》,弗尔曼诺夫《狱囚》,罗曼诺夫《技术的语言》《爱的分野》等等,还有相当多的政治、经济学和文学理论单篇作品,可以说是成果丰硕,影响了中国文坛及他个人的创作。

短篇小说《都霞》出场的只有四个人物,就是赤党军官华西里、白党军官、贵族少女都霞、白军军官太太。特别是作者为赤白这两位军官所设置的不同形象、行事风格及道德品质对都霞的影响,让一个女贵族最后同情革命,想变成一个“大写”的人,“新的感觉包围了她”,“自己感觉崇高”、挺身随瞒华西里的下落,反抗白军军官的探问,这绝非随意铺排,而是别具匠心。蒋光慈在刊载《都霞》第一期《新流月报》的编后认为:“《都霞》白色圈中所悟到的党人的崇高,比在‘红’的环境中觉悟的更有价值”,“这种从侧面表现的方法感动人的地方,比从正面写得深刻”。在《爱的分野译者小序》里,蒋光慈说:“本书……主旨是在于描写新旧恋爱观的冲突。这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可比,它实在含有伟大的意义,我们由此不但了解革命中的男女关系,而且了解革命的趋势。”所以,蒋光慈坦承:“我的《丽莎的哀怨》,这一篇就是我的很大胆的尝试。”而《丽莎的哀怨》也因为这种大胆尝试,被认为是蒋光慈代表作之一。而蒋光慈在1926年9月创作的短篇小说《徐州旅馆之一夜》,也可看出受这篇作品影响的痕迹。

1929年秋蒋光慈在《异邦与故国》日记中提出如何“艺术地将某一期间之社会生活的主要的脉搏,根本的源泉,表现出来”?即革命文学如何避免“政治宣传大纲”加“公式主义的结构或脸谱主义的人物”的弊端?蒋光慈首先注意到了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化。9月15日,蒋光慈在太社东京支部会上组织批评《丽莎的哀怨》。在国内一些左翼作家对《丽莎的哀怨》批评指责声中,冯宪章比较正确地评价了《丽莎的哀怨》的形式探索。冯宪章认为蒋光慈描写白俄贵族悲惨生活的反面表现手法,使小说形成散文诗的风格——这正是蒋光慈创作《丽莎的哀怨》的初衷。《丽莎的哀怨》以独特的叙事角度彻底冲决了蒋光慈的革命文学创作范式,给读者以惊异与新鲜。这种“反面表现方法”的采用,正是蒋光慈受苏联作家谢廖夫的小说《都霞》影响的结果。在这期的编后中,蒋光慈还引用钱杏邨的一篇随笔介绍《都霞》:“这种表现的手法,是万分值得从事普洛文学作家注意研究的。”“由此可以想到我们自己试作的一些‘抱着柱子固定的转’的笨拙的表现法可笑……”《丽莎的哀怨》就是蒋光慈借鉴《都霞》打破“抱着柱子固定转”的一次“很大胆的尝试”。《丽莎的哀怨》和蒋光慈所有的作品一样,成为畅销书,并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查禁。

(作者工作单位:安徽省经济管理学院)

## 谈蒋光慈的早年译著苏联短篇小说《都霞》

□胡金凤